

自60年代起,台湾顺应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发展轻型出口加工工业,以外贸带动整个经济“起飞”,终于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但是,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岛内外环境的变化,台湾经济陷入全面困境。那么,如何使其摆脱困境,则日益为岛内外所关注。

一、台湾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一) 在外部,国际经济环境中各种新矛盾接踵而至,台湾经济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

1. 面临美国等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的“挑战”。自从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经过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和海湾战争,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结束了战后持续繁荣的局面,出现停滞或严重衰退情况。美国等工业发达国家于是纷纷掀起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这对以出口为导向、以贸易为生命线、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台湾经济是一个巨大冲击。因此,近年来美台在双边贸易谈判中,谈判内容已由轻纺、农业扩大到金融、运输、智慧财产权、劳工等许多领域。美国对自台湾进口产品的设限已由纺织品、大米,扩大到钢铁产品等许多项目,条件也较以前苛刻。在美国的压力下,台湾当局不得不对关税、汇率政策进行调整和放宽。新台币被迫大幅度升值,从1986年初的39.33元兑1美元,升为1987年底的28.55元兑1美元;1990年又升至25.25元兑1美元。^①台湾经济严重依赖美国,本身开放程度又不够,是台湾经济继续发展的一大难题。

2. 面临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挑战”。台湾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由于主要发展以劳力密集型为主的加工出口工业,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强劲的对手。而现在,不仅亚洲“四小龙”中的南朝鲜后来居上,与台湾激烈竞争;南美、东南亚等许多后进国家或地区也在发展与台湾类似的加工出口工业,对台湾经济构成了潜在威胁。例如,南

试论台湾 经济发展 中的问题 及解决的 根本途径

原生

朝鲜,在60年代以前,是亚洲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经过20多年的飞速发展,已成为亚洲“四小龙”中人口最多、经济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领头龙”。它的汽车、造船、钢铁以及电子产品出口盛旺,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南朝鲜向来主张“技术立国”,进入80年代后,励行经济改革,期望本世纪末能跻身“世界十大技术先进国”之列,成为“亚洲第二个日本”。^②东南亚地区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南美的巴西等国都在相继发展劳力密集型的轻纺工业和家用电子工业,并且把产品销往国际市场。因此,台湾在经济上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它处在“前有悬崖,后有追兵”的两难境地。

3. 面临祖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挑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实施和进一步发展,大陆不仅对国际资金和技术日益形成“强大的吸引力”,比如1984年9月中英香港问题协议签字后,香港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步与大陆的市场和人力资源结合起来;而且对台湾资金和技术也有一定的吸引力,比如至1990年底,闽、赣、浙、沪等沿海地区,吸收台湾资金额累计愈10亿美元,台商厂家上千家。此外,由于台湾当局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无意与大陆全面发展经济合作关系,所以双方不能联袂挺进国际市场。随着大陆向国际市场的拓展,许多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尤其是美、日和香港市场)上已经和台湾产品展开激烈的竞争。目前,双方在美国市场发生竞争的商品达3000多项,香港市场有250项,日本市场也有近百项。竞争的商品多为劳动密集型的轻纺产品,如纺织、成衣、玩具、旅游用品、家具鞋类、手工艺品、农渔产品等,也有一些机械和电器产品。这些轻纺产品质量相当,但由于大陆产品成本低廉,价格便宜,台湾产品根本不是竞争对手。当然,台湾正致力于发展机械、电子等策略性工业和

石油化学工业，预计今后双方在这类产品上必有一番更加激烈的竞争。

(二) 在内部，由于经济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的原因，台湾经济面临一系列问题。

1. 劳资矛盾激化。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台湾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基本矛盾。80年代以前，由于台湾当局实施“戒严令”，工人应有的基本权利，如罢工、示威、组织工会等都受到严格限制，台湾工人长期处于沉默状态，被形容为“最驯服与安分的一群”。1970年台湾发生的劳资纠纷仅63起。进入80年代，劳资纠纷案件迅速上升，劳工运动逐渐成为对台湾具有较大冲击力的社会运动。据统计，1980劳资纠纷案件不过600件，1984年上升为1154件，1986年多达1470件，平均每天有4件。1987年以后更是有增无减。劳工运动较典型者有：1981年夏天爆发的卡林（卡林塑胶公司）工会“自力救济运动”，时间持续3个多月；1985年新玻（新竹玻璃公司）工人“自力救济运动”被称为“揭开了台湾工人运动新的里程碑”，历时达15个月之久。此后，工人请愿、罢工、游行事件不断发生，连公营大企业，如“中船公司”、“台铁公司”都有大规模工人抗争发生。③1987年党禁开放后，工党、劳动党相继成立，劳资矛盾激化已成为台湾经济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2. 环境污染严重。唯利是图是资本家的本性，台湾当局为片面追求高速“经济成长”，忽视环境保护，到了80年代工业污染已相当严重。据调查，工业污染已位居台湾民众十大死因的前列。造成工业污染的工厂不仅来自中小企业，而且也来自官营垄断企业和民间大财团。目前，台湾十大公营制造业中就有8家被列为污染企业，全省被列为有污染可能的工厂就有5000多家，其中83%属已污染工厂。④正因为如此，台湾工业与公害已严重危及农田、水域、近海和自然生态平衡甚至人民的生命安全。广大民众为维护生态环境，自发掀起了反污染、反公害的“自力救济”运动。80年代以来，这一运动绵延不绝，日益高涨。它的斗争矛头不仅针对现有工厂的污染与公害，而且针对将要设厂的资本。1985年7月，美国杜邦公司提出在彰滨设立二氧化钛工厂申请，并获准。消息传出后，彰滨地区的民众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最后迫使杜邦公司撤回申请。之后，“台塑”申请“六轻案”，台湾当局拟兴建“核四厂”、“五轻案”，均因民众反

对而未果。

3. “三大资本”之间矛盾加剧。官营资本是国民党统治台湾的经济基础，垄断台湾经济命脉。据统计，目前仅“国营”、“省营”事业的资产总额就达8万亿元新台币，为台湾500家大民营制造业资产总额的8.7倍，其营业额占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的35%。但是，自80年代以来，私人资本迅速膨胀，资本过剩严重，强烈要求“公营事业民营化”。因此，台湾当局被迫首先开放加油站民营，并拟定三家商业银行等开放民营的措施。当然，“公营事业民营化”不仅涉及利益重新分配问题，还关系到国民党统治的根本问题，故当局始终以种种借口延缓民营化的步伐，民间资本与官营资本之间相互冲突与斗争日益加剧。

80年代以前，台湾被认为是外国“资本家的乐园”和“投资天堂”，外国跨国公司在那里投资赚钱就象“抽水机抽水”一样容易。进入80年代，台湾本地资本经济实力已大大增强，与外国垄断资本的矛盾日益突出。这种矛盾不仅表现在争夺投资领域上，而且特别表现在技术转移和销售渠道的控制与反控制方面。外国垄断资本把台湾看成它们的国外“加工制造基地”，利用当地优质和相对廉价的劳动资源与自己先进技术的结合，不断获取超额利润。外国垄断资本，特别是在台投资最多、分布最广的日本垄断资本，总是在技术转移上“留一手”，“把重要的东西留下来”，企图把台湾变成它们的“经济殖民地”。台湾资本为能在科学技术上自立生根，总是千方百计企图摆脱日本垄断资本的控制。例如，规定合资企业聘用本地技术人员比例、产品自制率等，企图达到技术转移。因此，台湾资本对日本垄断资本是“充满爱恨交织的情绪”。⑤在国际销售渠道上，40年来，日本九大商社盘据着台湾，“无孔不入”。⑥迄今，台湾出口产品约30%仍掌握在日本商社手里，而出口到日本的产品则90%是通过日本商社进行的。多年来，台湾当局设想组织大贸易商，制订了《大贸易商辅导准则》等条例，从70年代后期起成立了一批大贸易商，但目前仅存6家，规模很小，根本无法与日本商社竞争匹敌。但是，台湾资本与日本商社在国际行销渠道上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并不因此而减弱。近年来，台资大量外流，一方面固然是到海外投资设厂，另一方面也是为摆脱日本商社控制而在海外自行建立销售据点。

80年代以前,外国资本多是在机械,电子、化学等领域对台湾私人资本进行一定的控制。80年代后,外国在台湾资本正随着台湾当局各种政策的放宽而调整经营策略。它们更多地采取独资经营方式,或在合资企业中占有多数股份。比如,外国资本已逐步展开“鲸吞行动”,有的收买台资企业的全部股份权,逼台资放弃所有权和经营权,有的在合资企业中大幅增资,使其股权比重上升过半,甚至达80%左右,以取得对公司的控制权。同时,外资还逼台湾当局准许外商代表获选“工业总会”、“商业总会”理事等职,以便通过参加表面上的经济事务活动,加强对整个行业的控制和影响。可见,私人资本与外国资本之间必然存在激烈的争夺。

此外,投资环境恶化,民间投资意愿低落,“地下经济”泛滥,农业生产衰退,工业升级困难等等都是台湾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总之,台湾经济正面临着空前的“挑战”。昔日发展经济的内外有利因素正逐渐消失,新的不利因素正逐渐上升。正如有些学者所说,台湾经济正处在“十字路口”,面临“经济风暴的前夕”。①

二、解决台湾经济发展中问题的根本途径

当前台湾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已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综合了经济、政治与社会等方面的复杂问题。对台湾经济冲击最大的其实并不是经济本身,而是政治形势。由于台湾前途不确定,必然引起岛内投资意愿衰退,政治、社会不安定,以及各种矛盾相继迸发。因此,影响台湾经济继续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台湾当局对祖国统一大业所采取的错误态度和政策。不解决这个问题,台湾经济就无法保持持续繁荣,台湾社会就无法保持长期稳定。

台湾当局为摆脱经济问题的困扰,设想和采取了使台湾“工业升级”、“全面开放”,实行自由化和国际化并把台湾建成综合性自由贸易区和金融、贸易、航运三大区域性中心等措施。美国国会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也为台湾献了四条“锦囊计妙”,比如恢复总体经济均衡,调整汇率,实行自由贸易,扩大海外投资等。台湾某些人士审时度势,对台湾经济面临的种种困难和未来发展趋势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厚植竞争的优势基础,重振企业的创造精神,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等等。这

些办法,或脱离台湾岛情或没有考虑大陆方面的因素,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台湾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解决台湾经济问题的最根本的途径,在于台湾与大陆统一。这是台湾经济永远摆脱外国控制,不受世界经济衰退打击,能够独立自主地稳定发展的根本出路。如果说,台湾当局过去尚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发挥台湾的优势,通过内向型和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实现了台湾经济的“起飞”和发展的话,那么在当前,台湾当局更应认清台湾经济问题的严重性和祖国统一的必要性,果断地与祖国大陆经济携手合作,走内向型和外向型相结合的经济道路,促进台湾经济的持续发展。

与祖国大陆经济相结合,将从根本上改变台湾经济发展的内外条件,为台湾经济带来诸多便利。

1. 台湾能够从祖国大陆获得充足的能源,摆脱对外国能源的依赖,这是台湾经济继续发展的最有利条件。能源是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社会经济愈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亦愈多。但是台湾能源资源十分缺乏,主要依赖进口。台湾经济要继续发展,首先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据台湾资料统计,到1986年,煤炭可开采量只1.8亿吨,年产量172.5万吨,占能源供应的2.86%;天然气蕴藏量247亿立方米,年产量12.09亿立方米,占供应量的2.91%;水力发电蕴藏量530万千瓦,年发电量74.2亿度,占供应量的4.45%。台湾能源产量占能源总供给量的10.4%,其余89.6%的能源要靠进口。其中,石油的80%以上从中东的科威特和伊拉克等国进口;煤炭的76%要从澳大利亚和美国进口;核燃料全部由美国和南非供应。②鉴于上述情况,从经济观点出发,台湾进口能源的理想条件应该是:供货稳定,且具潜力,运程要近,价格低廉。而祖国大陆不仅社会稳定,能源丰富,而且与台湾仅一水之隔,能源质优价廉。1986年大陆煤炭已探明储量8458.6亿吨,居世界首位,总储量估计约4万亿吨;石油、铀矿资源也颇具潜力。但是,由于资金、技术和运输力量不足,开采能源资源的潜力未能充分发挥。1986年煤年产量8.9亿吨,出口只有1000万吨;石油年产量1.31亿吨,出口也仅3000万吨。这与我国相对丰富的资源状况是很不相称的。台湾目前所需要原油2000万吨,铀燃料150吨,不管将来所需能源数量多少,大陆完全可以优先满足台湾的要求。因此,台湾经济若与大陆经济共同合作,首先在能源问题上便可摆脱外国资本的控

制。

2. 台湾能够从祖国大陆获得广阔的国内市场,保障产品有稳定可靠的销路。台湾总面积只有3.6万平方公里,人口2000万,国内市场狭小。台湾发展加工出口工业后,其产品多系劳动密集型的轻纺产品,这些轻纺产品主要出口美国、日本和香港等地。美国是台湾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日本是台湾的第二大出口市场,香港是台湾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但台湾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不仅要与美、日商品竞争,而且还要与大陆产品发生竞争。随着国际市场的复杂多变,台湾外部市场难免摇摆不定,险象丛生。祖国大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总面积和12亿人口,大陆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它既广阔、稳定,又适合台湾产品销售。1979年台湾出口的工业品,其价值只相当于大陆潜在的城乡购买力。台湾的五大出口工业品,不论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在祖国大陆都会有较好的销路。因此,获得大陆市场,能够刺激台湾工业不断发展,促进台湾经济持续繁荣。

3. 台湾经济与大陆经济相结合,可以避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所带来的风险,而作为我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继续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尤其是海湾战争和东欧、苏联剧变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的变化。国际垄断势力一方面加紧对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企图把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另一方面加紧对第三世界或弱小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渗透,竭力把包括台湾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变成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祖国大陆在这种严峻形势面前,在这场反腐防变斗争中,致力于发展经济,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做到了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方向不变,人民安居乐业,初步取得了反和平演变的胜利,大大提高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因此,台湾经济依托大陆经济和市场,可扬长避短,走上持续稳定的发展道路。

4. 台湾的民族资本可以到祖国大陆投资设厂或合营有关企业,并将得到特别的优待,使台湾民族资本能够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贡献力量。这就可避免到外国投资的各种风险。台湾的民族资本是台湾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6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企业数不断增加,并形成企业集团,在台湾经济中,越来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台湾民族资本到海

外投资设厂,无论在资金、生产技术上,还是在产品销售上,都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相反,大陆则会为台湾民族资本回内地投资设厂提供诸如土地、人力、工业用水和政策等多方面的优惠待遇。这样,既可刺激台湾民族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增强民间投资意愿,又可配合大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件造福于炎黄子孙的益事。

5. 可以同邻省开展传统的民间贸易,活跃物资交流。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方针后,大陆普遍实行灵活和有弹性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在沿海的广东、福建、海南、上海等省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台湾可以较快地同这些地区进行经济合作和交流。

由此可见,台湾经济和大陆经济存在着较高的“经济互补性”。二者相结合,不仅对大陆经济有利,而且对台湾经济的继续发展将有更大利益。但是,近年来,无论台湾政界,还是工商学术界人士,在讲话或文章中都表示过这么两种疑虑,即:(1)担心两岸经济联系密切后可能导致台湾过份依赖大陆市场,成为大陆经济的“附属区”;(2)担心台商对大陆投资会“使对方壮大”。这些疑虑是缺乏根据的。第一,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大陆根本无意“控制台湾”,对台湾问题根据“一国两制”原则来解决,这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这种疑虑反映了一种传统思维方式同当今世界现实发展的不适应性。第二,从国际分工和比较利益的原则看,国际经济形势复杂,两岸合作势在必行,而这种合作可以使台湾得到更多的实惠。首先,可化解严峻的外部环境给台湾造成的冲击;其次,虽然在一段时间里,大陆低技术产品可能会打击台湾的边际产品(待转移或淘汰的轻纺产品),但从长远看,二者之间的竞争却会促进台湾“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于台湾经济前途有益无害。当然,如果台湾当局痛下决心与大陆合作,那么这些疑虑就不是疑虑了。

令人欣慰的是,台湾经济与大陆经济的共同合作已揭开序幕。自1987年7月台湾“政治解严”后,当局采取更富弹性的对大陆政策,在坚持“不接触”的前提下,适度放宽两岸经贸往来。据统计,两岸间接贸易已从1978年的五亿美元发展到1989年的34.8亿美元;1988年双边贸易额达25亿美元,预计1992年转口贸易总额将达70亿美元。⑩从(下转第20页)

评论斯图亚特的整个经济思想，利润理论和资本理论也不是他的整个经济思想。因此，马克思在这里根本没有必要对斯图亚特作出所谓“总的评价”，他也完全不可能作出“总的评价”。因为马克思在这里仅仅是要分析和说明斯图亚特在利润和资本问题上的理论观点，以及它们的长处和短处，他完全不需要对斯图亚特作出“总的评价”。同时，他也不可能仅仅根据斯图亚特的利润理论和资本理论，就以点概面、以偏概全地对斯图亚特作出“总的评价”。所以，认为马克思在手稿第一章中对斯图亚特作出了“总的评价”，把他总的评价为重商主义者，是不能成立的。

应当指出，在手稿第一章中，马克思所讲的“总的说来”几个字，仅仅是针对“让渡利润”讲的，并没有针对斯图亚特的整个经济思想，甚至也没有针对第一章的资本理论。

总之，要对斯图亚特进行“总的评价”，就必须全面涉及他的整个经济思想，必须从他的总体思想或主体思想、主流思想出发，而不能仅仅抓住他的经济思想的某一方面或侧面就妄加评论。“让渡利润”论只是斯图亚特经济思想的一个局部，而决不是它的全部。因此，即使斯图亚特在这个问题上和重商主义的观点完全相同，也不能据此把他定性为重商主义者；何况他的“让渡利润”论

已经不同于重商主义，已经有了许多重大的差别，并且还受到马克思的重视和肯定。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手稿第一章中只是要考察斯图亚特的利润理论和资本理论，并未全面涉及斯图亚特的整个经济思想；正如《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只是分析斯图亚特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而未阐述他的整个经济思想一样，这是由两本著作的不同内容所决定的。因此，马克思在手稿第一章中根本不需要对斯图亚特作出“总的评价”。第一章中的“总的说来”几个字，显然只是针对“让渡利润”讲的，并未针对第一章中的资本理论。所以，只是抓住“总的说来”几个字，就贸然断定马克思对斯图亚特作出“总的评价”，实在是不科学的。

注释：

①②③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11、13、14页。

⑤⑥⑦⑧⑨同上书第13卷，第155、41—53、155—156、156、47页。

⑩同上书第46卷下册，第479页。

⑪同上书第11卷，第601页。

⑫同上书第16卷，第326页。

⑬详细情况可参阅拙文：《再论斯图亚特经济思想的评价问题》，《天府新论》，1991年第2期。

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76页。

(责任编辑 曹德国)

(上接第62页)

1981年首家合资进入大陆至1989年底，大陆吸纳台资累计已达1067项，10.57亿美元。^⑩

综上所述，台湾目前面临的挑战形势是严峻的，但只要台湾当局认清形势，早日与大陆携手合作，实现统一大业，台湾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景一定是光明的。

注释：

①资料来源：台湾环球经社资讯研究中心的统计。

②李相文等著：《亚洲“四小龙”》，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页。

③参阅：邵宝林著：《台湾社会问题面面观》，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6页。

④参阅：韩清海：《8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的几个特

征》，载《台湾研究集刊》，1990年第1期。

⑤⑥台湾《天下杂志》，1987年6月，第73期。

⑦参阅：《今日台湾100问》，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⑧资料来源：台湾《经济部能源委员会年报》，1986年。

⑨参阅：《经济日报》，1992年3月18日。

⑩参阅：《福建日报》，1990年3月28日。

(责任编辑 徐云鹏)